

官员到访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洪 群¹, 戴亦一²

(1. 闽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2.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以 2004—2014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利用手工收集的官员到访数据, 实证检验了官员到访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结果显示: 官员到访能够显著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与非官员到访企业相比, 官员到访企业具有更低的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进一步研究发现, 官员到访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 不仅受到产权性质和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影响, 而且因“一把手”机制和到访目的而存在差异, 即官员到访的税负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税改后公司中; 与非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访相比, 只有党政班子成员到访才能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视察和调研等指导性官员到访能使企业税率显著下降, 但检查和督察等监督性官员到访会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

关键词:官员到访; 税收负担; 适用税率; 实际所得税率

中图分类号: F2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892 (2018) 01-0111-11

DOI:10.13676/j.cnki.cn36-1030/f.2018.01.011

一、引言

中国居民和企业的税负问题一直是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统计, 2015 年中国宏观税负为 30.1%,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38.8%。但在 1994—2015 年期间, 中国税收收入占 GDP 比例的年均增长率连续 18 年高于同期 GDP 增长率。这种现象在中外历史上相当罕见。此外, 美国《福布斯》发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名显示,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近几年一直高居全球前三。税收超常增长无疑会加重企业经济负担, 使其面临恶劣的发展环境, 进而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 企业抱怨税收负担过重的声音越来越大。为了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实施减税降费已然成为国家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因素有很多, 最直接的, 当法定税率下降公司实际税率也会下降 (Dyregang 等, 2017)。^[1]除此之外, 现有研究企业税负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从公司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两个层面

收稿日期: 2017-07-21 修返日期: 2017-11-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宗族文化与公司财务行为: 基于族谱与姓氏的研究” (71772155);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独立董事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中的作用研究——基于闽企的经验证据” (JAS170252)

作者简介: 洪 群, 闽南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研究, 通讯作者联系方式 hongqun021@126.com; 戴亦一, 厦门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

展开：就公司资源禀赋而言，已有文献从公司规模和资产特性（Stickney 和 Mcgee, 1982）、资本结构（Porcano, 1986）、企业成长性和盈利能力（Derashid 和 Zhang, 2003）、公司治理（Desai 等, 2007）、商业模式（Higgins 等, 2015）、产权性质和金字塔结构（Zhang 等, 2016）等方面解释了在法定税率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实际税负不一致的现象；从制度环境的视角来看，学者侧重关注税制政策（吴联生和李辰, 2007）、地方政府治理（曹书军等, 2009）、金融环境（刘行和叶康涛, 2014）、财政分权（张敏等, 2015）、政策不确定性（陈德球等, 2016）和环境规制（曹越等, 2017）对转型经济国家公司税负的影响。^[2-13]这些文献表明，企业税收负担不仅取决于法定税率，还取决于各种环境因素制约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然而，关于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诸多文献都是从政府这一“黑箱”的角度展开，看不见作为实体的政府官员。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政府是由官员所组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其实是作为政治权利代表的政府官员动机的体现。因此，企业税收负担的高低，也受到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考察官员行为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新兴加转轨的中国资本市场背景下，官员影响企业行为最直观、最普遍的现象莫过于官员到访活动。通过整理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关于官员到访活动的报道发现，2013 年共有 1012 家的企业得到 4803 次的官员到访。由于政府官员拥有强大的资源分配能力和自由裁量权，上市公司非常看重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参观访问。这种普遍直观的官员活动对于企业经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有文献发现，官员视察的到访活动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赵晶和孟维炬, 2016）、改善公司绩效（罗党论和应千伟, 2012），并帮助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等关键性政策资源（戴亦一等, 2015）。^[14-16]实际上，上市公司也往往会通过这种政企密切接触良机来表达帮助和支持的诉求。其中税收征管和政策帮扶就是政府官员和企业经常互动的重要话题之一，而到访官员一般也会做出积极响应。由于政府官员在税收征管政策上拥有很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其绩效考核又与征税努力紧密相关，到访活动自然成为政府官员推行税收政策的一种渠道。那么，政府官员是否会通过到访这一没有政治风险的方式帮助企业，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从而呈现普遍的官员到访税负效应？同时，这种影响是否会因为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或者因为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而呈现差异？官员的职权和到访目的又是否会影响官员到访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

为解答以上问题，本文以 2004—2014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官员到访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企业产权性质、新企业所得税法、“一把手”机制以及到访目的对官员到访税负效应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随着经济学文献对政府质量及治理效率的重视，学术界开始日益关注官员在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逐渐重视能够产生普遍又直观影响的官员主动行为，如视察等官员到访活动。张雯等（2017）考察了政府官员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视察活动，发现这种政府“帮助之手”可以增强会计师事务所的议价能力，提高后者的审计收费水平。^[17]在以政府官员到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发现，官员视察能够改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绩效，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更为明显。^[15]官员视察等到访活动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既能够传递政企关系信号，帮助企业缓解信息不对称，继而推动企业间联盟（罗党论和李晓霞, 2014）；企业也可藉此获得资源优势，不仅能取得政府补助等关键性资源（戴亦一等, 2015），还可以通过提升组织合法性来正向影响创新激励（赵晶和孟维炬, 2016）。^[18, 16, 14]视察等官员到访的微观经济效应说明，政府官员能够通过个体行为来影响微观层面企业的经营，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对公司政策有影响的官员活动。由于我国税

收环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税收征管空间巨大, 企业能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以及享受多大规模的优惠,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官员的认定和审批 (陈德球等, 2016)。^[12]因此, 企业与政府官员的互动即官员到访可能成为税收负担的重要解释变量。本文认为, 到访活动是企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最为直接的方式, 同时暗含了一定的政治意义, 因而对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首先, 官员到访是密切政企关系、增进政企交情的重要渠道, 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税收上的好处, 进而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根据寻租理论, 政府机构能够通过干预或管制行为形成设租空间。当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如税收政策资源, 具有较强的掌握和把控能力时, 这些资源将成为企业竞相争夺的对象, 政府官员将成为企业寻租的关键目标。由于税收是政府干预企业的一种重要方式, 地区间税收机制的执行力度和自主决策权又存在很大差异, 这就使得政府官员在具体的税收征管时往往拥有较大的设租空间, 结果企业可以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获取税收上的寻租好处。而在企业近距离接触寻租目标 (政府官员) 的渠道中, 官员到访恰好是一种重要方式。这将使政企双方在短时间内增强对彼此的了解, 有助于拉近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减少双方之间的陌生感, 增进政企交情。在减轻税收负担努力上, 这种交情一方面具有“润滑剂”功能, 能够帮助企业向政府部门表达更为有效的诉求, 提高税收优惠申请的批准概率, 以及在应纳税所得上获取更大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 政企交情又能够发挥“保护费”作用, 影响政府对企业税收规避等降税措施的监督力度, 从而影响企业实施这些措施的难易程度和积极性。由此来看, 官员到访将会影响政企交情, 诱发企业寻租激励, 进而有利于企业通过税收优惠、纳税筹划等方式减轻自身税收负担。

其次, 政府官员到访活动本身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能够传递一定的政治信号, 增强企业在获取税收好处上的竞争优势, 并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 在具体的税收征管过程中, 政府部门作为税收政策的执行者, 公司作为纳税人, 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作为税收政策执行者的政府部门无疑面临着信息劣势。那么, 在税收征管过程存在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且官员在执行税收政策时又拥有很大支配权力和决策灵活性的情况下, 企业能否获得税收优惠, 以及得到多大规模的优惠,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官员对纳税人信息的全面了解及信赖程度。由于官员莅临参观访问的企业往往都是具有示范效应的行业标杆, 到访活动本身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向外界说明被访问企业是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这将有助于缓解税收征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增强政府对纳税人信息的信赖程度, 使政府部门凭借官员到访所传递的信号, 迅速识别出那些对地方经济发展更有影响力的企业, 进而在税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给予更多合情合理的倾斜。此外, 根据前景理论, 在遴选税收政策优待对象时, 税收征管部门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 而官员到访所传递的政治信号恰好能够降低政策导向解读失误所引发的政治风险。由此, 企业一旦得到官员访问, 将具有更大的概率获得税收征管部门的优待, 继而争取更多税收政策上的好处以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同等条件下, 相对于非官员到访企业, 官员到访企业的适用税率更低。

假说 2: 同等条件下, 相对于非官员到访企业, 官员到访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更低。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4—2014 年中国 A 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 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 (1) 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 (2) 剔除当年新上市公司, 以确保能够获取计算所需的上一年的财务数据; (3) 剔除税前利润为负或者所得税费用为负的样本, 以确保实际所得税率的计算无偏差; (4) 剔

除实际所得税率大于 1 或小于 0 的样本；(5) 剔除未披露的样本以及财务数据不全的样本；(6) 样本公司设有公开网站，且网站新闻中心关于官员到访的报道信息必须翔实，从而保证能从每则报道中获得有关到访活动的时间、目的以及到访官员的个人资料。最后，本文获得样本观测值共计 5959 个。

官员到访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变量，也是上市公司网站中十分醒目的报道材料。因此，官员到访数据主要来源于各上市公司网站新闻，并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来进行补充。适用税率和企业产权性质的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其他所需财务数据均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并通过计算得到。

(二) 检验模型及相关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假说，本文构造了如下模型：

$$ATR = \alpha_0 + \alpha_1 InspDm + \alpha_2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1)$$

$$ETR = \beta_0 + \beta_1 InspDm + \beta_2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2)$$

在模型中，除了适用税率 (*ATR*) 和实际所得税率 (*ETR*) 之外，其余变量均采用滞后一期（即上一年度）的数据。这主要由于官员到访后需要时间才能产生税负效应。根据研究假说的预期， α_1 和 β_1 预计显著为负。上述模型中各相关变量的定义及其计算方法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
适用税率	<i>ATR</i>	取自 WIND 数据库
实际所得税率	<i>ETR</i>	(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 / 息税前利润
官员到访	<i>InspDm</i>	若上市公司在前一期曾得到官员到访，取值 1；否则为 0
产权性质	<i>SOE</i>	当样本属于国有企业时，取值 1；否则为 0
公司规模	<i>Size</i>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i>Lev</i>	年末负债总额 / 年末资产总额
资本密集度	<i>CapInt</i>	年末固定资产净额 / 年末资产总额
存货密集度	<i>InvInt</i>	年末存货 / 年末资产总额
盈利能力	<i>ROA</i>	当年税前利润 / 年末资产总额
投资机会	<i>MB</i>	年末公司市场价值 / 账面价值
行业变量	<i>Industry</i>	行业固定效应
年份变量	<i>Year</i>	年度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

通过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略），表明官员莅临上市公司进行访问视察现象较为普遍。依据是否有官员到访对样本进行分组均值检验，结果显示，相对于非官员到访企业，官员到访企业具有更低的实际所得税率，本文假说 2 得到初步证实，即官员到访能够帮助企业降低实际所得税率，与吴文锋（2009）一致。^[19]

(二) 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2 验证了官员到访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1)、(2) 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份和行业

效应之后，官员到访 (*InspDm*) 的系数为 -0.0022，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对于非官员到访企业而言，官员到访企业的适用税率更低，假说 1 成立。从 (3)、(4)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实际所得税率 (*ETR*) 对官员到访 (*InspDm*)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官员到访能够降低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假说 2 得以验证。

表 2 官员到访与企业税收负担关系的回归结果

	ATR		ETR	
	(1)	(2)	(3)	(4)
<i>InspDm</i>	-0.0022* (-1.7354)	-0.0044*** (-2.9599)	-0.0062*** (-2.5845)	-0.0054** (-2.2279)
<i>SOE</i>		0.0067*** (4.6647)		0.0054** (1.9828)
<i>Size</i>		0.0057*** (9.8878)		-0.0012 (-1.0711)
<i>Lev</i>				-0.0029*** (-3.0053)
<i>CapInt</i>				-0.0639*** (-7.3488)
<i>InvInt</i>				0.0219* (1.9212)
<i>ROA</i>				0.0162** (2.0939)
<i>MB</i>				0.0014* (1.9405)
<i>Constant</i>	0.2213*** (29.1284)	0.0963*** (6.8124)	0.1253*** (8.8664)	0.1566*** (5.5548)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959	5959	5959	5959
R ²	0.3048	0.3236	0.1111	0.1267

注：括号内为 z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三) 内生性问题

现有官员到访的相关研究数据都从公司网站收集的，但该数据的收集可能受到公司网站运营状况的影响，使官员到访的测量存在误差。此外，税收是政府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重要形式，企业税收负担问题也可能成为官员莅临企业调研视察的原因。因此，本文拟采用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的地形起伏度作为官员到访的工具变量，来修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理由为：在地形起伏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更强。那么，地形起伏度与最能直观体现政府主导性作用的官员到访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地形起伏度是客观地理因素，与公司财务行为不直接相关。因此，地形起伏度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工具变量。

本文采用封志明等 (2007) 提取的城市地形起伏度，设置工具变量地形起伏度 (*CityDX*) 加入两阶段处理效应模型。^[20]表 3 列示了内生性检验的结果。其中，(4) 列是在 (1) 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官员到访的其他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官员到访前一期的企业产权性质 (*SOE_{t-1}*)、公司规模 (*Size_{t-1}*)、盈利能力 (*ROA_{t-1}*)、公司年龄 (*Age_{t-1}*) 和广告支出力度 (*AD_{t-1}*)。广告支出力度 (*AD_{t-1}*) 通过销售费用 / 销售收入来衡量。表 3 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计算而得的变量 *Lambda* 在第二阶段回

归中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检验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在第一阶段回归中,无论是否加入影响官员到访的控制变量,官员到访 ($InspDm$) 对工具变量地形起伏度 ($CityDX$) 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地形起伏度 ($CityDX$) 适合作为官员到访的工具变量。而在采用地形起伏度 ($CityDX$) 这一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之后,无论是适用税率 (ATR) 还是实际所得税率 (ETR),官员到访 ($InspDm$)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官员到访确实能够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3 内生性检验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InspDm$	(2) ATR	(3) ETR	(4) $InspDm$	(5) ATR	(6) ETR
$CityDX$	0.1167*** (4.0061)			0.0972*** (3.3054)		
SOE_{t-1}				0.2745*** (6.6654)		
λ		-0.1531*** (-6.6932)	-0.1154*** (-2.6881)		-0.1419*** (-5.7289)	-0.0971*** (-2.08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959	5959	5959	5693	5693	5693
Pseudo R^2 / R^2	0.0199	0.3284	0.1277	0.0347	0.3177	0.1295

注:括号内为z值;***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五、进一步研究与稳健性检验

(一) 产权性质的影响

终极产权不同的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在获取税收等政策资源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陈德球等,2016)。^[12]因此,官员到访的税负效应可能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利润通常不是其效用函数中的唯一考量因素,税收筹划积极性自然不会太高。同时,国有企业领导可能来源于当地官员,甚至可能在将来转任为政府官员。这种半官半商的隐形组织架构,使得国有企业指望官员到访降低税收负担的动机不会太强烈。此外,国有企业的税收通常有稳定地方财政收入的作用,降低国有企业的税负通常需要慎重考虑。由此综合来看,官员到访对国有企业的税负效应可能有限。相反,非国有企业普遍缺乏与政府亲近的机会,自然也不会经常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在承担社会职能上更不会成为政府眼中的得力助手。这种相对平行的社会角色安排,使得非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难以存在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到访活动是企业与政府官员近距离交流的宝贵良机,而且并不是每家非国有企业都有条件争取得到的,因此非国有企业的势必十分看重官员到访所创造的政企互动良机,并会想方设法通过官员参观访问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政策好处,比如在税收优惠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同时由于与政府之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一旦得到政府官员的参观访问,非国有企业可能会因为到访活动所传递的政治信号而得到政府部门更多的关注,进而享受更多税收征管上的“照顾”,比如在税收优惠的认定和审批上具有更大的政策灵活性。

鉴于产权性质对官员到访税负效应的影响,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表4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了分别考察。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样本中,适用税率 (ATR) 和实际所得税率 (ETR) 对官员到访 ($InspDm$)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官员到访不会影响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相反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无论是适用税率 (ATR),还是实际所得税率 (ETR),官员到访 ($InspDm$) 的回

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官员到访能够帮助非国有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综合验证了官员到访税负效应因产权性质而不同。

表 4 产权性质对官员到访税负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1)ATR	(2)ETR	(3)ATR	(4)ETR
<i>InspDm</i>	-0.0027 (-1.3342)	0.0010 (0.2527)	-0.0047*** (-2.9413)	-0.0103*** (-3.52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838	2838	3121	3121
R ²	0.2745	0.1324	0.3346	0.1437

注：括号内为 z 值；***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二)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影响

2008 年 1 月 1 日，我国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结果税率调整的方向与公司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蔡蕾等，2017)。^[21]显然，公司税收负担也会受税改的影响。那么当新企业所得税法营造出公平公正的税收征管环境后，税收征管空间将会缩小，企业向政府寻租的渠道也会减少，此时官员到访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认为，税改之前，税收优惠的种类繁多，税法关于税前费用列支、收入等项目的规定不够明确统一，税收征管环境相对宽松，上市公司更容易争取税收优惠。因此，税改之前，宽松的税收征管环境将会降低企业利用官员到访的主观需求，而多重的寻租渠道则会淡化官员到访角色，最终导致官员到访不会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税改之后，在新原则指导下，所得税各项要素都得到标准化，原有税收政策上的差别对待消失，税收优惠体系从“区域优惠”转变为“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总体税收优惠的具体方式和专项税收优惠政策也由国务院明确规定。这些改变无疑缩减了企业在税收上获取优惠的寻租空间。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税率下降带来的税收损失，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会趋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的是全国范围内公平的税收征管环境，较难继续通过地方保护主义维持税收上的竞争优势，因而必须寻找新的替代机制来弥补税收资源争取上的劣势，而官员到访所传递的政治信号恰好为其提供了契机。由此可见，税改之后，公平的税收征管环境和官员到访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将会使企业更为重视和充分发挥官员到访的作用，从而通过官员到访减轻自身税收负担。

为此，考虑到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官员到访税负效应的影响，根据税改时间，表 5 对 2008 年之前和 2008 年之后（包含 2008 年，下同）的样本分别进行了考察。由统计结果可知，2008 年之前，无论是适用税率（ATR），还是实际所得税率（ETR），官员到访（*InspDm*）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

表 5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官员到访税负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

	2008 年之前		2008 年之后	
	(1)ATR	(2)ETR	(3)ATR	(4)ATR
<i>InspDm</i>	-0.0013 (-0.1373)	0.0087 (0.8366)	-0.0050*** (-4.3092)	-0.0072*** (-2.91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32	432	5527	5527
R ²	0.1513	0.2308	0.3735	0.1254

注：括号内为 z 值；***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明, 税改之前, 官员到访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反, 在 2008 年之后, 企业适用税率 (ATR) 和实际所得税率 (ETR) 对官员到访 ($InspDm$)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50 和 -0.0072, 且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税改之后, 官员到访有助于改善企业税收负担状况。综合来看, 官员到访与企业税收负担的关系因新企业所得税法而呈现差异。

(三) “一把手”机制的影响

在“一把手”权力运行机制下, 是否属于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往往决定了官员对于资源配置的控制力。因此, 企业能否通过官员到访活动争取税收好处, 以及争取多大规模的税收好处, 可能会因到访官员是否属于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而存在差异。如果莅临企业参观访问的官员只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 他们就很难拥有与企业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关键资源, 自然难以帮助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相反, 莅临企业视察访问的若是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他们将对企业生存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诸如税收优惠资格认定和审批等重要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均掌握在他们手中, 企业自然会高度重视这些重要领导人的到访活动, 并藉此得到更大的政策倾斜。在现实中也不难看到,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莅临企业访问时, 一般会有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随同, 而负责接待的企业领导也几乎都是总裁、董事长等公司重要领导。这样一来, 政企双方领导进行交流,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不仅能从全局上把握企业诉求, 还能对诉求作出更加有力的回应, 甚至出现上级领导当场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在到访之后立马给予企业支持的景象。因此,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访更有可能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为此, 根据到访官员是否属于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本文将官员到访区分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访 ($InspDm_dz$) 和非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访 ($InspDm_fdz$), 并构造模型 (3) 和模型 (4), 以检验“一把手”机制对官员到访税负效应的影响。其中,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包含了党委书记、行政一把手、副书记、常委、相关行政副职等成员。若企业在前一年受到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参观访问, 虚拟变量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访 ($InspDm_dz$) 计为 1, 否则为 0。非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访 ($InspDm_fdz$) 的取值同理。根据理论分析, α_1 和 β_1 预期显著为负, 而 α_2 和 β_2 预期均不显著。

$$ATR = \alpha_0 + \alpha_1 InspDm_dz + \alpha_2 InspDm_fdz + \alpha_3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3)$$

$$ETR = \beta_0 + \beta_1 InspDm_dz + \beta_2 InspDm_fdz + \beta_3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4)$$

表 6 的结果显示, 无论是适用税率 (ATR), 还是实际所得税率 (ETR),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访 ($InspDm_dz$)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而非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访 ($InspDm_fdz$)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 只有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参观访问, 才能帮助企业减轻税收负担。此外, 在非国有企业和税改后的细分样本中, 官员到访的税负效应也因“一把手”机制而不同。

表 6 “一把手”机制对官员到访税负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

	全样本		非国有企业样本		2008 年之后样本	
	(1)ATR	(2)ETR	(3)ATR	(4)ETR	(5)ATR	(6)ETR
$InspDm_dz$	-0.0029** (-2.0679)	-0.0051* (-1.9370)	-0.0039** (-2.1700)	-0.0065* (-1.9585)	-0.0043*** (-3.3779)	-0.0074*** (-2.7348)
$InspDm_fdz$	-0.0018 (-1.2990)	-0.0000 (-0.0072)	-0.0012 (-0.6872)	-0.0045 (-1.3936)	-0.0016 (-1.2214)	0.0005 (0.17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959	5959	3121	3121	5527	5527
R ²	0.3233	0.1267	0.3344	0.1429	0.3736	0.1254

注: 括号内为 z 值; *, **,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四) 到访目的的影响

从官员到访企业的新闻可知，按照到访的目的，官员到访可以分为检查、督察等监督性官员到访和慰问、调研、视察等指导性官员到访。其中，监督性官员到访往往就企业某项具体活动进行检查，以确保企业经营符合政府规定。同时，到访官员也会借此机会肯定企业工作的可取之处，并指出工作的下一步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到访官员之间通常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企业很难通过监督性官员到访来表达自身在政策资源获取上的诉求。即使有所表达，也可能因为监督性官员到访活动的目标而难以实现。而且，监督性官员到访本身就是为了确认企业某项工作的达标情况，而企业纳税情况是官员检查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使得企业避税等税收筹划行为的曝光概率可能上升。结果，监督性官员到访不仅不会降低企业税率，反而有可能使企业面临更重的税收负担。不同于监督性官员到访的是，指导性官员到访是主动性更强的官员行为，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慰问激励企业家等先进模范人物和提升鼓舞企业士气，有时甚至是特意为企业排忧解难而来。在访问过程中，官员往往要求随行人员和有关部门配合企业做好工作，为企业撑腰壮胆，大力支持企业的发展。企业在指导性官员到访的过程中更有机会和动力表达真实想法，政企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更为密切。因此，一旦得到指导性官员的到访，企业可以凭借其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在争取税收好处上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而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指导性官员到访活动更加清晰地识别出重点帮扶对象，并在具体的税收征管上给予更多“关照”。

为此，根据到访目的，本文将官员到访区分为指导性官员到访 ($InspDm_zd$) 和监督性官员到访 ($InspDm_jd$)，并构建模型 (5) 和模型 (6)，以检验到访目的对官员到访税负效应的影响。其中，指导性官员到访 ($InspDm_zd$) 包括了官员视察、调研、慰问、指导等带有指导关怀性质的活动。若企业在前一年受到指导性官员到访，计为 1；否则为 0。监督性官员到访 ($InspDm_jd$) 的取值同理，其意指检查、督查等旨在确认企业是否完成目标任务或者符合规定标准的一切活动。根据理论分析， α_1 和 β_1 预期显著为负，而 α_2 和 β_2 预期均不显著，或者显著为正。

$$ATR = \alpha_0 + \alpha_1 InspDm_zd + \alpha_2 InspDm_jd + \alpha_3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5)$$

$$ETR = \beta_0 + \beta_1 InspDm_zd + \beta_2 InspDm_jd + \beta_3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6)$$

由表 7 可知，在全样本中，适用税率 (ATR) 和实际所得税率 (ETR) 对指导性官员到访 ($InspDm_zd$)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但对监督性官员到访 ($InspDm_jd$)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只有通过指导性官员到访获得税率上的优惠，但会因为监督性官员到访而面临更重的税收负担。同样，无论是非国有企业样本，还是税改后样本，官员到访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也因到访目的而存在显著差异。

表 7 到访目的对官员到访税负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

	全样本		非国有企业样本		2008 年之后样本	
	(1) ATR	(2) ETR	(3) ATR	(4) ETR	(5) ATR	(6) ETR
$InspDm_zd$	-0.0061*** (-4.5978)	-0.0069*** (-2.8038)	-0.0055*** (-3.3628)	-0.0128*** (-4.2983)	-0.0067*** (-5.6257)	-0.0086*** (-3.3764)
$InspDm_jd$	0.0071*** (4.0984)	0.0078** (2.3954)	0.0046* (1.8128)	0.0084* (1.8156)	0.0055*** (3.5537)	0.0072** (2.17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959	5959	3121	3121	5527	5527
R ²	0.3256	0.1276	0.3354	0.1455	0.3755	0.1261

注：括号内为 z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五)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改变实际所得税率的度量方式,参考 Porcano (1986) 的做法,将实际所得税率定义为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3]第二,加入地区分类的控制变量 (*Area*),变量设置参考王延明 (2003) 的做法;^[22]第三,加入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市场化指数 (*Inst*) 和经济发展水平 (*ED*),其中市场化指数 (*Inst*) 来自于樊纲等 (2011) 和王小鲁等 (2017) “中国市场化指数”项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D*) 通过省份人均 GDP 来度量。^[23-24]上述稳健性检验最终未改变主要结论。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04—2014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官员到访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结果发现:官员到访能够显著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与非官员到访企业相比,官员到访企业具有更低的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到访的税负效应不仅受到产权性质和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影响,而且存在“一把手”机制和到访目的上的异质性,即官员到访的税负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税改后公司中;与非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访相比,只有党政班子成员到访才能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视察和调研等指导性官员到访能使企业税率显著下降,但检查和督察等监督性官员到访会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可见,官员到访会影响企业的寻租行为,帮助企业获取税收政策上更多的好处。

本文的启示在于:第一,我国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员的执行力度,政府监管部门应该严格监督减税降费的决策过程,指导企业根据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高效的税收筹划。同时,鼓励企业建立并维持正常的政商关系,减少企业在税收政策帮扶过程中对特殊关系资本的依赖,进而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并提高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二,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帮助非国有企业通过规范、公平的渠道获取税收政策上的好处。第三,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谨慎解读官员活动所传递的政治信号,保证税收优惠政策产生合理的激励效果。第四,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要重视对官员行使职权的监督,尤其是要加强对重要部门官员行使权力的监督,使重要领导人的决策在综合群体智慧的基础上更加透明化。第五,政府部门应该严格监督官员的政治活动,提高官员执行公务的规范化水平,增强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 [1]Dyreg S. D., Hanlon M., Maydew E. L., Thornock J. R.. Changes i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over the Past 25 Year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124(3): 441-463.
- [2]Stickney C. P., Mcgee V. E.. Effective Corporate Tax Rates the Effect of Size, Capital Intensity, Leverage, and Other Facto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82, 1(2): 125-152.
- [3]Porcano T. M.. Corporate Tax Rates: Progressive, Proportional, or Regressiv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1986, 7(2): 17-31.
- [4]Derashid C., Zhang H.. Effective Tax Rates and the “Industrial Policy”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Malaysi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 Taxation*, 2003, 12(1): 45-62.
- [5]Desai M. A., Dyck A., Zingales L.. Theft and Tax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4(3): 591-623.
- [6]Higgins D., Omer T. C., Phillips J. D.. The Influence of a Firm's Business Strategy on its Tax Aggressivenes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5, 32(2): 674-702.
- [7]Zhang M., Lijun M., Zhang B., Yi Z.. Pyramidal Structur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and Firms' Tax Burden: Evidence

- from China's Local SOE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6, 36(2): 15-25.
- [8]吴联生, 李 辰. “先征后返”、公司税负与税收政策的有效性[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4): 61-73.
- [9]曹书军, 刘 星, 张婉君.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上市公司实际税负[J]. 世界经济, 2009, (4): 69-83.
- [10]刘 行, 叶康涛. 金融发展、产权与企业税负[J]. 管理世界, 2014, (3): 41-52.
- [11]张 敏, 叶慧芬, 董丽静. 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政策有效性[J]. 经济学动态, 2015, (1): 42-54.
- [12]陈德球, 陈运森, 董志勇. 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J]. 管理世界, 2016, (5): 151-163.
- [13]曹 越, 陈文瑞, 鲁 昱. 环境规制会影响公司的税负吗?[J]. 经济管理, 2017, (7): 163-182.
- [14]赵 晶, 孟维炬. 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9): 109-126.
- [15]罗党论, 应千伟. 政企关系、官员视察与企业绩效[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 (5): 74-83.
- [16]戴亦一, 洪 群, 潘 越. 官员视察、媒体关注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15, (7): 13-25.
- [17]张 雯, 刘耀淞, 张 敏, 杨会丽. 官员视察会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吗?[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7, (3): 3-17.
- [18]罗党论, 李晓霞. 官员视察与企业联盟——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4, (3):3-20.
- [19]吴文锋, 吴冲锋, 芮 萌.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 管理世界, 2009, (3): 134-142.
- [20]封志明, 唐 焰, 杨艳昭, 张 丹. 中国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J]. 地理学报, 2007, (10): 1073-1082.
- [21]蔡 蕾, 苏文兵, 李心合. 税率调整、公司避税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J]. 当代财经, 2017, (6): 120-132.
- [22]王延明. 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研究——来自规模、地区和行业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03, (1): 115-122.
- [23]樊 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0 年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24]王小鲁, 樊 纲, 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Can Official Visits Relieve Corporate Tax Burden?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HONG Qun¹, DAI Yi-yi²

(1.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2.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 Taking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4-2014 as the sampl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official visits on corporate tax burden with the hand-collected data of official visi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official visits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corporate tax burden. Compared with the enterprises visited by non-officials, the enterprises visited by officials have lower applicable tax rate and real income tax rate.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the tax burden relieving effect of official visits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w of Corporation Income Tax, but also has differences due to the “top leader” mechanism and the different visiting purposes, i.e., the tax burden effect of official visits exists only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ompanies with reformed tax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visits of non-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hip members, only the visit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hip members can relieve the tax burden on enterprises. The inspective and investigative visits of the instructive officials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enterprises' tax rate, while the checking and supervising visits of the supervising officials can induce heavier tax burden on the enterprises.

Key words : official visits; tax burden; applicable tax rate; real income tax rate

责任编辑: 蒋尧明